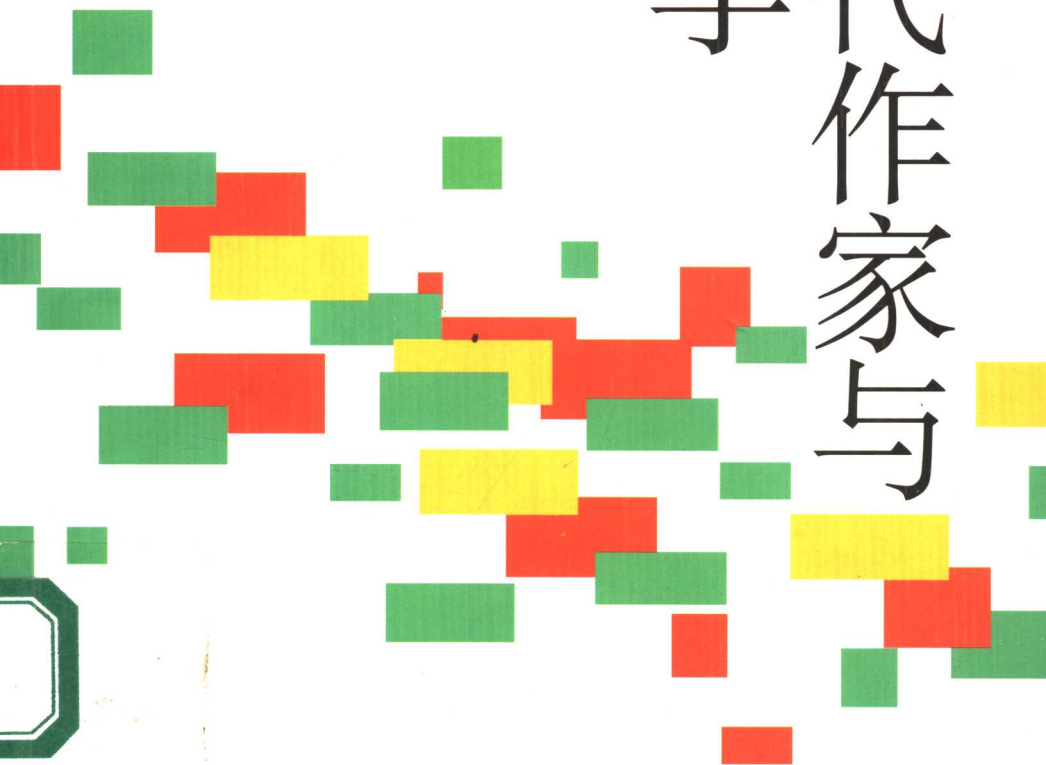


韦建国 李继凯 畅广元 等著

陕西当代作家与 世界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韦建国 李继凯 畅广元 等著

陕西当代作家与 世界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陕西当代作家与世界文学/韦建国, 李继凯, 畅广元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12
ISBN 7-5004-4022-7

I. 陕… II. ①韦… ②李… ③畅… III. ①作家—人物研究—陕西
西省—现代 ②文学研究—世界 IV. ①K825.6 ②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5982 号

责任编辑 罗 莉
责任校对 林福国
封面设计 毛国宜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010-64031534 (总编室)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3 插 页 2

字 数 313 千字 印 数 1—3000

定 价 2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我看《陕西当代作家与世界文学》

(序一)

马家骏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学理论教学与科研的三位教授联袂挂帅写成的《陕西当代作家与世界文学》一书，是一本具有相当现实价值和一定探索意义的专著。

当今世界，全球化已成为无法回避的现象。全球化具有造成文化的同质一体和促成文化多元并存的双重功能。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诸多事实既证明了异质文化之间的碰撞、交流、借用、吸收可使双方受益，尽管这种交流并非完全平等，很多时候甚至是一边倒的，同时也印证了撇开本土强调全球，或撇开全球只强调本土都不能使边缘的弱势文化保持长久的生命力。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切入，思考着全球化与本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以及本土文化如何重新认识和自我理解等等问题，见解虽然因人而异，但提出的研究课题和引发的讨论却时时引起巨大反响。

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命题，引发了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者的热烈讨论。置身于文学创作第一线的作家，对于作品中的世界性因素

有着比理论家更直接的体认。由于是从具体的创作实践出发，作家的认识往往比较感性、鲜活，因而更具雄辩力和说服力，即使是那些比较独特，甚至是难免偏颇的见解也有不容忽视的参考价值。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犹如建构一座大厦，具体地分析我国当代著名作家的创作与外国、异族的文化、文学之间的关系，探讨他们作品中的“世界性因素”，则是为建构大厦添砖加瓦。

《陕西当代作家与世界文学》立足于陕西，探讨陕西当代著名作家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是因为陕西位于西北东部，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基础和坚实的现实文化基础。三秦大地，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曾长期是向外传播中国文化的辐射源。陕西在悠久漫漫的历史岁月中，不仅向外辐射中国文化，同时又是外来文化的回收地，积淀了丰厚的历史文化基础。由于历史的复杂原因，西部经济还处在明显的弱势地位，当中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付诸实施的时候，陕西的文学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腾飞。20世纪五六十年代，柳青的长篇、杜鹏程的中篇、王汶石的短篇曾一度代表中国大陆文坛的高水平。进入90年代，“陕军东征”，引发文坛大地震。从1978年以来，陕西当代作家获得中国作协颁发的纯文学国家级奖就多达40余人次。特别是贾平凹还获得了第八届美国“飞马文学奖”、法国国际费米那文学奖、法国文学艺术荣誉奖等众多的国际奖项。作家们的优秀作品奠定了新时期陕西作为一个文学大省的坚实根基，显示出了陕西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不容忽视的地位和影响，他们的创作建构了陕西文学的坚实的现实文化基础。

在众多有成就的陕西作家中，《陕西当代作家与世界文学》选定贾平凹、陈忠实、路遥、高建群、叶广岑、红柯等六位作家作为研究对象，不仅仅是这些作家的创作硕果累累，个性特色鲜

明,还因为他们的影响巨大,在陕西乃至全国都有相当大的代表性。路遥因《平凡的世界》、陈忠实因《白鹿原》等佳作荣获中国文学最高奖“茅盾文学奖”,贾平凹的作品屡屡引发文坛震动,掀起阵阵“贾平凹热”,并在海外引起巨大反响。他们三人被评论界认定为继柳青、杜鹏程、王汶石之后的“陕军”第二代领军人物。虽说究竟谁能扛起第三代文学大旗还要看以后的发展,但研究者们预测的目光大多瞄向高建群、叶广岑和红柯。《陕西当代作家与世界文学》以这六位作家为研究对象的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他们身处西北的陕西,都深受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浸淫,却表现出了强烈的开放意识和在世界文化的层面审视民族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他们都心仪手追过一些外来文化和外国作家,受到过明显的外国外民族异质文化的影响,并在借鉴和学习中进行着有成效的文化创造。

这六位作家因创作成就显著而受到国内评论界的关注。《陕西当代作家与世界文学》转换视角,跨越民族文化的界限,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中,分析作家们的创作与异质文化、西方文学的关系。以往对于“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难以突破“影响——接受”、“冲突——反映”和“进口——出口”的模式。《陕西当代作家与世界文学》转变学术思路,关注创作主体,从作家的具体文本话语和我国转型时期的实际语境出发,研究不同文化在陕西作家创作中的互识、互证和互补,分析作家们在传统文化转型和民族新文化建构方面的探索。这样对有相当代表性的创作主体的个案研究,具有坚实的文学事实基础,避免了空对空的抽象思辨,因而更具说服力。在此基础上升华的理论 and 蕴涵于其中的规律,不仅适用于当代陕西文学的世界性研究,在全国范围内也有一定的普适性。

《陕西当代作家与世界文学》表明,陕西当代作家在不同文

化、文学之间的互识、互证及互补中，经历了对异质文化和文学的模仿、过滤、文化阐释和民族新文化样式的创造等过程，程度不同地回答了学者们研讨“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时提出的种种问题。陕西作家认为，民族文学作品的世界性并非仅仅由其表现的内容决定，而应关注其内容中蕴含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取向。如果作品真实地再现了符合人类历史发展大趋势的进步意识和现代意识，表现了对普遍人性的探索，弘扬了美和善，那么，无论作品的人物、事件、语言多么独特，其民族性多么鲜明，它都会被世界各民族的读者理解和接受，因而也就具备了世界性。那些摒弃民族传统的精华，亦步亦趋地追随和模仿外民族的作品没有世界性，同样，那些津津乐道发展中民族陈规陋习甚至将其视为所谓“民族特色”的作品，只能引起外民族读者的厌恶而遭拒绝。一部作品的世界意义不在于其叙述的故事内容的古老或现代，而在于其意识和境界是否具有进步性、现代性和普适性。对当代作家来说，最熟悉、感受最深还是生活于其中的当代社会生活，写起来也得心应手。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当代文学作品的世界性因素与作品表现的我国现代化意识、社会现实生活的内容更为密切一些。陕西作家并不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性是世界现代性的惟一模式。现代化因民族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内涵和表现形式、相异的标准和尺度，但一定要符合人类文明进程的共同规律，顺应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国别文学、民族文学是否具有世界性，关键不在于写什么和运用什么样的技巧写，而在于是否表现出一些“人类相通的东西”。

《陕西当代作家与世界文学》指出，在与异质文化的互视、互证的过程中，陕西作家感悟到西方文化的精华，深刻体认到民族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凸显出的种种局限，并在创作中自觉地借鉴和学习异质文化、文学的精髓。陕西作家坚持民间立场，

胸怀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创作中“作品主要写生活，少加观念方面的东西，政治评价呀道德评价呀都不可直接堆到作品上”。他们的作品“从现实生活中抓住当时的时代社会心态问题”，真实地“为社会作记录”，准确地再现了时代精神和民众心态，在表现复杂人性的同时，批判了现实中的丑恶，宣扬美善理想，探讨“人类究竟怎么样才生活得好”。他们对照异质文化，“借鉴西方文学的境界”主要体现在一个“真”字上。正因为他们的作品真实地记录了我们民族转型时期的社会生活的原生态，表现了“一些人类相通的东西”，尽管在国内引发了不同的反响，但影响巨大，在海外也深受欢迎。

《陕西当代作家与世界文学》说明，文学影响与接受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文化过滤的过程。陕西作家根据自身文化积淀和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进行有意识的选择、分析、借鉴，并在自己的作品中加以重组，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不是影响源本身，而是我国转型时代和环境的要求。在浮躁情绪的影响下，弄虚作假和作秀浮夸倾向抬头的时候，粗制滥造的观念小说和追随“时尚”的作品层出不穷，弘扬求真务实之风就是当务之急。陕西作家偏重现实主义作为精神而非仅为一种创作方法出现在文学之中，他们追求的“现实主义”骨子里就是“求真务实”，就是秦地农人式的朴素理解：“咥实活！”也就是对假大空的厌恶和对真善美的追求。陕西作家借鉴西方文学的境界，坚守现实主义传统创作出了具有强烈时代精神反映转型时期社会生活的优秀作品，既反拨了我们民族文学粉饰现实的传统，同时也给当代文坛注入了一支清醒剂。海外读者评价陕西作家的作品不同于他们以往接触到的大陆作品，原因恰恰也在于此。

《陕西当代作家与世界文学》肯定了在与异质文化、外国文学的互识、互证、互补的过程中，陕西作家对民族文化精华的深

刻体认。作家们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在建构本土新文化时,特别注重发掘和弘扬传统文化中那些能够为我们提供思想、价值和能够指导本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精华要素。陕西作家的创作和探索证明,西方现代意识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存在,对本土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有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它绝不是我们民族现当代文学的成因的全部。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不是中国文学中的“西方现代意识”,而是中国文学中的“中国现代意识”。中国现代意识生成于传统文化的转型和民族新文化的建构之中,既含有本土文化的精华,也有经过本土文化过滤、整合后的外来异质文化的因子。

在向外国文学大师借鉴和学习的过程中,陈忠实格外关注对复杂人性的解析,并在与本土文化及时代环境的融合中形成了自己创作的风格。他的中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白鹿原》,在揭示人性方面既有鲜明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又具有世界范围内的普适性,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高建群经历了对艾特玛托夫和自我的两次超越。他的作品不但具备了艾特玛托夫作品的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丰厚的内涵、深刻的哲理和震撼读者心灵的悲剧美,而且更显西北黄土高原文化特有的苍凉和宽厚。在高建群的作品里,弗洛伊德思想和劳伦斯的创作的影响明显可见,但与西方作家不同的是,高建群比较注重女性形象对性意识的觉醒和追求的发掘,思考的是女性性活动及繁殖能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功用和影响,以及因此而在人的理性层面和精神领域产生的对民族生命力的感悟。他在黄土高原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上、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塑造各种女性形象,把她们与古老的黄土地联系在一起,探索中华民族的生存之谜和发展之谜。高建群的小说向国人呼唤:激活女性黄土高原上的野性的力,再造中华民族新世纪的辉煌。当代中国要从这里冲向

世界!

西方文化、文学中的现代意识本身就具有多样性、差异性和具体性,以此为参照,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也并非铁板一块。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是具体的,他们在文化转型时期所面临的思想困惑、矛盾,以及个人的生命感受也不尽相同,因而在与异质文化、外国文学的互识、互证、互补的过程中探索民族新文化的建构和发展也呈现出了不同的倾向。《陕西当代作家与世界文学》指出了陕西当代作家的探索的四种走向:

一是叶广芩的“惟不能堕落”。叶广芩看到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传统文化的转型已成为必然。她写《采桑子》,“力图将对文化、对历史、对社会、对现实的关怀纳入这种初衷,纳入一种文化和传统家族文化的背景,使他们形成一种反差而又共生互补”。小说从贵族家族文化的背景中优化出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精华,批判和否定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消极面。作家强调了“中国几千年建立起来的道德观、价值观,深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骨髓中”的事实,尚未进一步探讨传统文化如何转型,民族新文化如何建构,但提出一个基本原则:“背叛也好,维护也好,修正也好,变革也好,惟不能堕落。”

二是路遥的“回归”。在外国文学大师的启发之下,理性力量渗透到路遥创作中的各个角落。服膺理性而采取的相应表达方式,构成了他创作的特点。对理性的执著也常常使路遥陷入矛盾或失误的泥淖之中。路遥在创作中过分地信赖理性,常有理性“过剩”的现象出现,即不能很好地与情感、形象融合为一体,如时有冗赘乏味的教训主义文字。即使是《人生》、《平凡的世界》这样的精心之作,也因外在理性的过剩造成了一些艺术遗憾。究其根本原因,显然是民族传统文化突出“载道”功能的理念的影响所致。追求道德完善是路遥吸收外国文学精华的一个重

要方面，他将自身所受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与之结合，形成自己的道德完善目标与准则，并将之实践于写作之中。人们在读《人生》与《平凡的世界》的结尾部分时，多有一种不满足或怀疑的感觉，因为加林与少平的道德化的“回归”，似乎并未将人们引到一片新道德的天地之中去。应该说，这是与现实生活、作家意识的局限密切相关的。作家的探索明显地表现出了向传统的回归。

三是红柯的“离去”。红柯在异质文化的氛围中审视传统文化，思考文化的转型，探索民族新文化的创建。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异质文化不仅为红柯的文学生涯提供了丰富的营养成分，还改变了他的生活，导引了他的西域之行。少数民族独特的生活方式、伊斯兰文化的价值观念与红柯的审美理想相呼应，造就红柯极富诗意的小说在创作取向上追求人性的自然生长、赞美性格的原始强力。作家以异质文化作为参照，从反思中使母体文化的精华摆脱遮蔽获得彰显，进而对母体文化进行理想的拯救和新质补充。作家在小说《西去的骑手》里，无意陈说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给社会经济带来的损害，而是更着意于展示英雄的剽悍和野性。英雄骑手马仲英生命中激荡着的英雄气质之所能引起红柯创作情感上的激动，从个体层面而言，是作家经验的共鸣与期待；而从文化层面来看，则是作家对母体文化日益趋于庸俗浮躁、疲软虚脱现状的忧患，以及希望向充满原始生气与力量的伊斯兰文化寻求拯救药方的理想。

四是贾平凹的“全球地方主义”。在如何使中国文学和陕西文学走向世界这个问题上，贾平凹表现出了比同时代作家更强烈的自觉意识。他“近年写小说，主要想借鉴西方文学的境界”。《浮躁》再现了当代中国社会变革之艰难，表现了我们这个富有传统的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来自自身的种种束缚和制约，

精妙地概括出了弥漫各个阶层国民的“浮躁”情绪和心态。小说表明,浮躁情绪引发的种种丑恶现象,是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所致,但浮躁精神的出现却是国民自我表现张扬主体精神的结果。《废都》、《白夜》和《土门》这三部长篇的内在联系显现出了贾平凹的探索,“《废都》写了西京人的生活从一元向多元的转化,展示现代人灵魂的迷失与漂泊;《白夜》其实说前途一片黑暗,就往回找,向传统栖落;《土门》中要回到传统也不可能,城市化几乎是强制性的……”。

小说《高老庄》集中地体现了贾平凹对传统文化转型和建构适应于现代化的民族新文化等问题的思考。贾平凹通过小说明确表达了对传统文化种种弊端的深恶痛绝。时常被国人津津乐道的最具“中国特色”的“悠久的历史”、“长城”、“孔子”、“京剧”、“熊猫”、“饮食文化”等在小说里被置于民族存亡进退的层面而加以否定。《高老庄》表明,旧有的本土文化传统只有与先进的外来文化因子结合才有可能变异转型,建构生成新的文化。小说中的温良恭俭让的菊娃不是一个开拓进取的女强人,但却是一个在社会转型时期不浮躁的外来文化的接受者。菊娃所表现出的“中庸”代表着贾平凹的思考和探索:在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互动中,绝对的对立,两败俱伤,而一方对另一方完全的替代则更不可能;精神文化领域的变异和转型绝非一日之功,相对的平衡和相对的对立互相交替,是传统文化吸收外来先进文化而逐渐发生变异达到转型的最好方式。

贾平凹的探索或许并不是最好的选择,但不像叶广岑那么笼统和模糊,不像红柯的“离去”,也不同于路遥的“回归”,而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中针对我国转型时期的现实提出了个人探索意见,相似于西方学者提出的“全球地方化”或“全球地方主义”(glocalism)。这或许也是一种“中庸”,但是贾平凹的“中庸”

绝非向传统的妥协，而是相对对立中的相对平衡，其基础是不同文化互识、互证、互补，其发展走向是传统文化转型和建构新文化。贾平凹的思考和探索，或许并非完美，但深刻尖锐，在陕西和全国文坛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贾平凹的“全球地方主义”思想也表现在对文学艺术技巧的探索上。贾平凹受川端康成的启发并赞赏他的成功，但在艺术表现形式的探索 and 选择中，更接近于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他对外国文学表现技巧和形式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模仿、借鉴到中西比较，再到试图整合出适合表现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现实的艺术形式的探索过程。在探索如何“用中国的水墨画写现代的东西”的道路上，包括贾平凹在内的陕西作家并非步步完美，处处成功，还有不少缺憾，但不乏启发和参考意义。

《陕西当代作家与世界文学》通过研究陕西作家的创作与异质文化、外国文学的关系以及他们作品中表现出的现代意识说明，陕西当代文学接受了异质文化及西方现代意识的启迪和激发，在本土文化和自身处境中生成。陕西作家的作品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对于现代性的追求形成了反省、批判的现代意识，表现出了与外国文学表现技巧整合后的艺术表现形式，具备了中国语境下的现代性和世界性。这种现代性是经济欠发达的西部文学的现代性，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乃至现代化途中第三世界国家和民族的现代性的缩影。陕西作家的创作是一种文化创造，他们的探索对处于史无前例的改革时代的我国本土文化的转型，以及民族新文化的创建都具有参考意义。

《陕西当代作家与世界文学》在注重创作主体和本土语境的前提下，研究贾平凹、路遥、高建群、红柯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时，主要运用了影响研究和接受研究的方法。在对上述作家的研究中同时还以现代文学作家、作品为“中间媒体”和“变异体”，

将其与外国文学共同构成一个与研究对象相对的、大的参照体系,而且在比较研究中平行研究和阐发研究并举。《陕西当代作家与世界文学》根据研究对象的创作特点,注重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多样性,比如对陈忠实的研究就主要采用了阐发法,对叶广芩的研究重在平行研究。无论运用何种方法进行研究,《陕西当代作家与世界文学》都从作家创作的“原典文本”出发,以具体的作品文本实例为依据,揭示文本内涵的“多元文化”特征,在将研究对象与外国文学、异质文化做横向比较研究的同时,也将其置于民族文化、文学体系内作纵向比较研究,得到的发现和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已有的研究成果。

如果说,陕西当代作家的创作建构了秦地文学的世界性,促使陕西文学和中国文学走向世界,那么,《陕西当代作家与世界文学》一书就可为陕西走向全国面向世界,为中国文学的世界性研究做出一定的贡献。

《陕西当代作家与世界文学》资料翔实,特色鲜明,论点新颖,可作为中文本科学生、研究生比较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辅助教材或选修课教材。该书具有开放性和探索性,其中一些观点值得进一步研讨,对学生的学习不乏启发和促进作用。

我读《陕西当代作家与世界文学》

(序二)

杨昌龙

读完《陕西当代作家与世界文学》，掩卷沉思，心潮起伏，感慨良多。

韦建国、李继凯、畅广元三位研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艺学的教授，突破了个人原有的学科研究框框，更新学术思维，共同联手将陕西本土作家与外国作家同置于世界多元文化的大背景中，进行比较研究，写出了《陕西当代作家与世界文学》一书。他们的成果具有多方面的价值。

这是一本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专著。比较文学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昌盛起来的一门新学科，众多学者不仅在作家作品研究方面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在学科的历史总结和理论研究方面也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就在国际学界多次发出“比较文学危机”的声音，国内文坛也有人与之相呼应之际，《陕西当代作家与世界文学》的问世，创立了在世界文学的平台上研究我国地区性当代文学创作与外国的、异质的文化、文学关系的先例，为我国比较文学的研究展示了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彰显了比较文学的勃勃生机。

《陕西当代作家与世界文学》既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又表现出了适应于全国乃至整个第三世界的普遍意义。作为研究对象的贾平凹、陈忠实、路遥、高建群、叶广岑、红柯等六位作家全是陕西本土作家，是陕西作家第二和第三代领军人物，同时他们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量级人物，代表着我国新时期文学创作的某些走向。分析这些作家的创作与世界文学，与其他民族异质文化的关系，有助于促进陕西本土作家创作的繁荣发展，有利于我国当代文学世界性因素的研究和我国文化转型的探索，同时对第三世界国家、民族文学的现代化发展规律的研究也具有参考意义。

《陕西当代作家与世界文学》科学运用比较文学理论，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接受研究、跨学科研究多种方法并举。对贾平凹的研究，着重探讨了《浮躁》受塞万提斯和川端康成的影响，分析《废都》借鉴弗洛伊德的学说并将其与劳伦斯的创作做了比较，把《高老庄》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相比照。论述陈忠实，则用复调理论阐发，以证明《白鹿原》具有“最高意义的现实主义”特征，蕴含着“世界性因素”。在论述路遥受俄罗斯文学、日本文学和拉美文学深刻影响的同时，还专门将《人生》中的高加林与《红与黑》里的于连作了深入的比较分析。研究高建群，认为他崇敬艾特玛托夫并受其影响，但最终也超越了艾特玛托夫。对于叶广岑的《采桑子》的分析，则与托尔斯泰的贵族情结相联系。在对红柯作品的研究中，除了以赛珍珠为参照外，还中肯地指出：作家在梅里美和艾特玛托夫身上发现了自己。专著本身就雄辩地证明，在全球化大趋势影响下的多元文化语境中，比较文学具有特别旺盛的生命力。

《陕西当代作家与世界文学》视角独特，方法新颖，资料翔实，内容丰厚，理论分析严谨中肯，对作家作品的解读科学、客

观，但是，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比如，有的章节纯理论的论述和作品情节内容的引用稍多；个别论点似乎也过于简单，其判断性的结论还有待商榷。正因为如此，它才是一部具有创新价值和探索意义的学术专著，对于本科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来说，它也是一本选修课的崭新教材。